

◆“历史上的繁星”系列之三



应天书院全景

# 《岳阳楼记》外记 (五)

■文/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 
■图/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

## “君以民为体”思想的提出

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时对教育的历史作用有着这样的论述：“古者庠序列于郡国，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，何时教育哉？乃于选用之际，患于才难，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。”三代圣王治天下，必先崇学校、立师资、聚群材、陈正道。使其服礼乐之文，游名教之地，精治人之术，蕴致君之方。“劝学之要，莫尚宗经。宗经则道大，道大则才大，才大则功大。”

这期间，他留下很多珍贵的“范文”，如《君以民为体赋》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《政在顺民心赋》《尧舜率天下以仁赋》《老子犹龙赋》《铸剑戟为农器赋》《易义》《乾为金赋》《四民诗》等诗文。文章思想多为他政治改革的主张。

《君以民为体赋》篇中有：

### 范仲淹惜才如金

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，以“九河我吞，百谷我尊；良玉我切，浮云我决”的气概，继承和弘扬先师戚同文的教法，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，严格要求学生。他把戚同文“天下同文”的校训，发展成为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

范仲淹和戚同文一样“勤学恭谨，以身先之”。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。他一边任主持，一边担任“艺文”和“易经”两门课。他“每出题，必先自为之，欲知其难易所当用意，亦使学生准以为法”。

用现在的评价方式来说，范仲淹是一位爱才、惜才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好老师。他对学生的关心和支持，均是发自内心的爱护。

史书记载，在应天书院期间，他“常宿学中，训督学者皆有法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先之。夜

“天下之君，正四民而似正四肢，每防怠惰；调百姓而如调百脉，何患纠纷？先哲格言：明王佩服爱民，则因其根本为体，则厚其养育，胜残去杀，见远害而在斯；劝农勉人，戒不勤……谓民之爱也，莫先乎四体；为国之保也，莫大乎群黎……蒸人有罪，谅责己之情深；庆泽无私，诩润身之德著。著若君惠，则其民晏如。每视民而如子，复使臣而以礼，故能以六合而为大家，齐万物为一体。”

这是中国古代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精华。“君以民为体”是范仲淹在传统“以民为本”思想基础上的发展，也源自贾谊的“以民为命”。

贾谊在《过秦论》里总结秦帝国短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老百姓太过苛刻。所以，贾谊在

课诸生，读书寝食，皆立时刻。往往潜至斋舍，闻之，见有先寝者，语之……问未寝之时观何书，其人亦妄对，则取书问之，其人不能对，乃罚之”。这段文字说得明确，范仲淹教育有方，亲自督导学生学习，遇到学生偷懒、耍滑，便要处罚。

他还“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。诸子至，易衣而出”。翻译为白话文，意思是说范仲淹曾经拿出自己的俸禄来供养四方游学之士，几个儿子甚至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，范仲淹却始终泰然处之。

范仲淹对人才的爱护，很多已经成为故事，代代相传。

讲师籍颖的外甥张方平，家道贫寒，聪慧过人，在书院受到范仲淹关照和培养，直至成才。其后做过宰相，屡担大任，长期随范仲淹。连苏轼，也是张方平在四川任三司使时发现

《大政》(上、下)中反复强调“民”的重要。至北宋，赵匡胤的以文治国，比汉代适应了时代变化的要求，提高了社会的积极性、和谐性；范仲淹提出“君以民为体”，如果这样做来，国家还有什么矛盾是不能解决的？这比庄子“齐物我，齐是非”的理想社会要和谐，要人本化。“君以民为体，民以君为宗”超出了孔子“君为上、民为下”的等级制度，也比墨子的“民为重，君为轻”来得科学，更比法家的怀疑一切要进步。

范仲淹同时还提出把“劝农勉人，戒不勤”作为“庆泽无私”“谅责己情深”“厚其养育”等明王教化的要求。其“以民为本”“为国之保，莫大乎群黎”“不以己欲为欲，而以众心为心”的民本思想可称高贵。

并推荐入朝的。

苏轼一生都很尊敬他的这位老师张方平，更为一生未见到过老师的老师范仲淹而悔恨：“恨子不识范文正公”、“若获挂名其文字中，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，岂非畴昔之愿也哉？”苏轼竟以挂名于范仲淹“门下士之末”为最大心愿，可见范仲淹在苏轼心中的分量。

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，两次到书院乞讨，范仲淹各增一千缗，并赐《春秋》。当知道他因老母有病而不能读书时，就安排他在书院半工半读。直至范仲淹入京任秘阁校理，还致信戚舜宾(戚同文之孙)主持：“非我长者，岂能济乎”，要他照顾孙复。十年后，孙复成为讲解《春秋》的大师，被请入皇宫为仁宗讲学。范仲淹见了感叹道：“贫困是一种可怕的灾难，倘若孙复一生乞讨到老，这

### ■采访对象:孙纲

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一、二届理事，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理事，杭州范仲淹文化网顾问、商丘炎黄研究会理事，商丘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。

### ■阅读提示

1026年范仲淹从泰州捍海堰堤上来应天府为母亲守丧。他受留守晏殊聘请，又和他的老院长(山长)戚舜宾一起主持了应天书院。范仲淹在这段时间中创造了应天书院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辉煌。而这段经历，也集中体现了范仲淹一位教育家的风范。

孙纲老师认为，范仲淹的教育思想，以先于政治，服务于政治而经世致用、闻名于史，以“太平年间，患于才难，犹如不务耕而求获”警示后人，其意义深远。在一千年前，他就倡导经济专业、赞扬四民(吏、农、工、商)。他在商丘作有《四民诗》，在主持应天书院时，还上书万言《上执政书》，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思想、教育家的行动、治国的楷模。

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。”由此可见他对寒门子弟人才的爱惜，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此事也说明了他对教育人才的紧迫之感。

范仲淹在泰州时就认识年轻有志的富弼，但是富弼看到北宋当时的社会隐患和政治的腐败，不愿科举。范仲淹一再启发他要积极参与社会改革，于是富弼考入甲科，后来勇挑重担，荣立大功，出将入相，与范仲淹同时改革于“庆历新政”，成为北宋重要政治家之一。

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的第二年(1027年)，他的学生王尧臣、赵槩分别中了状元和探花，“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”。

我们可以列出很多有成就者的名字：富弼、张方平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、张载、文彦博、胡瑗、狄青、种世衡、王尧臣、赵槩、王安石、贾黯、彭如砺……他们都先后直接受到范仲淹的教育和启迪。



《应天骄子范仲淹》剧照

## 范仲淹开教育先河

范仲淹以睢阳学案独树一帜，上承儒道墨法，下启程朱理学，倡导了北宋文化复兴，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新儒学，推动了千年哲学史的发现，功不可没，影响深远。

范仲淹在此时有著名的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。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细细一读，因为其可谓是四大书院中品位最高的书院题名记。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与《岳阳楼记》可称为他一生中“最早”和“最晚”的记文，两文皆思想高远、意境深远、语言精炼。

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中，“九河我吞，百谷我尊；浮云我决，良玉我切”“博涉百家九流之说，有忧天下之心”透露出的豪言壮志和锐气，为《岳阳楼记》所不及；其也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范仲淹还在他主持书院繁忙之中写成了以宏文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。文中，他提出了“固邦本、厚民力、重名器、备戎狄、杜奸雄、明国听”18字方针，以及“请择郡守、举县令、斥游惰、去冗儒(闲散、冒用名誉)、遴选举、敦教育、举将材、保直臣、斥佞臣”的改革建议。《上执政书》因此被提到了与《隆中对》同等的地位。

1043年，“庆历三年十二月戊午，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”。应天书院与东京(汴京)、西京(洛阳)的国子监，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。同时规定太学生要求改“国子生(原三公子孙)为八品以上官员子孙和庶人俊秀”，开国子监招收百姓子弟的先河。

从孔子“有教无类”的主张，到戚同文的“天下同文”，到范仲淹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到“国子生为八品以上官员子孙和庶人俊秀”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平等的受教育权真正作为国家政策公布并实施，还是始于范仲淹。也正因为此，范仲淹把中华民族教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，为“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北宋”打下坚实的基础。